

下册

吴根友 孙邦金等 著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下冊

吳根友 孫邦金等 著

戴震乾嘉學術與中國文化

●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吴根友等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334-6903-0

I. ①戴… II. ①吴… III. ①戴震 (1723~1777)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9.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6106 号

选题策划: 孙汉生 徐建新
责任编辑: 骆一峰 徐建新 刘露梅
特约编辑: 吴嘉璐 陈 沅
装帧设计: 季凯闻

Daizhen Qianjia Xueshu Yu Zhongguo Wenhua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上、中、下)

吴根友 孙邦金等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07 87812652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77.5

字数 1269 千

插页 6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903-0

定价 298.00 元 (上、中、下)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第四编

学派、问题意识及其 相互关系与历史转折

本编着重研究清学由初兴到鼎盛期的三大方面的问题：其一，学派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汉考据学内部吴派与皖派、皖派与扬州学派之间的关系；其二，史学研究中的新问题，如“疑古”思想与考据史学的关系、方志学理论的原则之争；其三，贯穿整个乾嘉学术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的问题。由此三大方面问题所涉及的相互关系及其在不同领域所表现出的中国学术与思想的近代性特征。

乾嘉学术能够延续一百余年，与该学派内部的相互影响及学派后劲不断深化、强化该学派的学术方法特色，促进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方面做出的巨大成就有关。这与宋明理学在哲学观念、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表现出的推陈出新的风格非常不同。本编分五章。第一章，重新考察研究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术与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术的关系；第二章，研究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的经学思想、语言学、语言哲学、解释学思想及其对扬州学派的影响，以及扬州学派如何在人文知识积累方面对乾嘉学术的深化；第三章，研究史学研究中的“异数”崔述的“尊经疑古”思想在乾嘉以考据史学

为大宗时代的特殊学术意义；第四章，透过戴震与章学诚在方志学方面的争论，揭示乾嘉史学重视方志学的新特点，从而揭示乾嘉史学“经世致用”精神的另一个面向；第五章，通过对贯穿乾嘉学术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的分析，揭示乾嘉学术与宋明理学传统余绪的关系，从而考察乾嘉学术的精神及其方法的特征与局限性。

第一章 皖派与吴派的学术关系再辨证

——以戴震与惠栋为例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着力表彰惠栋对戴震的学术影响，把戴震在扬州与惠栋的会面看作是戴震一生学术的重大转折点。这一观点对于现代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李开在著《戴震评传》一书时也沿续这一观点。对于乾嘉时代极具影响力的两位学术大师之间的学术关系，我们亦本着乾嘉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重新考量，从而努力逼近学术史之真相。

第一节 晚明学风的转变与清初的学术特征

对于晚明学风的转变，学术界前辈与时贤已经有诸多研究成果了，^① 本节不作详论。仅择其要，并从其与清中叶学术研究的内在关系角度，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其变化。

一、反思理学与心学，重新回到气本论的哲学立场

黄宗羲继承其师刘宗周的思想遗产，以气本论为根基，融心学、理学于气学的思想体系之中，在气的条理处寻求心的主宰，在气的活动处寻找心的能动性。他一再反对“视理为一物”的观点。如在《胡直学案》中，黄宗羲通过重新解释胡直的“理在心，不在天地万物”的思想，表达了自己理、气、

^① 见第一编综述部分，另参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萧蓬父：《略论晚明学风的变异》，《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37—351页。刘墨：《乾嘉学术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心合一的观点，他说：

夫所谓理者，气之流行而不失其则者也。太虚中无处非气，则亦无处非理。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言我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无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堕落形骸，则不能备万物矣。不能备万物，而徒向万物求理，与我了无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万物，非谓天地万物竟无理也。^①

在上述文献中，黄宗羲的意思很明确，人心中的理，其实就是天地万物之理在人心中的反映，并不是理仅在人心而不在天地万物之中。在黄宗羲看来，所有将工夫与本体分成两橛的原因都是“认理气为二”的结果。所以，他一再强调：“造化只有一气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则者，即为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夫流行。”^②也就是说，气是万物的本原，理是气的条理化的表现，理不能离开气而独立存在，这种气一元论的思想是黄宗羲哲学的根本，也是其理论的出发点。

方以智在气本论的立场上不够一贯，中年以后又滑向了程朱理学的哲学立场，以太极、所以等精神实体作为世界的总根源。但在其早年的著作《物理小识》中，他充分地表达了气本论的哲学立场，如他说：“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里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③

在方以智看来，事、器、心、性命、天地等只是“物”而已。“物”的构成要素即是“气”，所以，“盈天地间皆物”的命题可以转化为“盈天地间皆气”的命题。如他说：“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④“世惟执形以为见，而气则微矣。然冬呵出口，其气如烟；人立日中，头上蒸歊，影

① 黄宗羲：《宪使胡庐山先生直》，《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11—512页。

② 黄宗羲：《同知刘师泉先生邦采》，《明儒学案》，第438页。

③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页。

④ 方以智：《天类》，《物理小识》，第3页。

腾在地。考钟伐鼓，窗棂之纸皆动，则气之为质，固可见也。充一切虚，贯一切实，更何疑焉？”^①

有学者认为，方以智是“火一元论”者，或者是“气—火一元论”者。其实，方以智曾明确地指出，火亦是气。如他说：“水为润气，火为燥气，木为生气，金为杀气……土为冲和之气，是曰五行。”^②又说：“火与气，一也。”^③他还指出“火即真阳之气”^④。由此可见，方以智仍然是气本论者。应当注意的是，他对气本世界的具体认识有超逸前人之处。如他说：“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⑤又说：“气凝为形，蕴发为光，窍激为声，皆气也。而未凝、未发、未激之气尚多，故概举气、形、光、声为四几焉。”^⑥“气动皆火，气凝皆水，凝积而流，动不停运。”^⑦在这里，方以智以气的不同状态来说明万物的具体差别，在气、形、光、声的“四几”中找到了统一的气之基础，同时还看到了未凝、未发、未激之“余气”。这些论述丰富了气本论哲学的具体内涵。

在气本论的立场上最为坚决而思想也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当数王夫之，他以气—诚—实有的系统化论述，将中国传统气本论哲学上升到最具哲学纯粹性的理论高度，从而对他之前的一切带有唯心倾向的哲学本体论思想给予了总清算。他认为，无论人知与不知，人所面对的太虚世界都充满着实有之气，并非佛、道二家所说的“无”。他说：

虚空者，气之量；气弥纶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⑧

① 方以智：《天类》，《物理小识》，第3页。

② 方以智：《天类》，《物理小识》，第11页。

③ 方以智：《人身类》，《物理小识》，第78页。

④ 方以智：《人身类》，《物理小识》，第78页。

⑤ 方以智：《天类》，《物理小识》，第5页。

⑥ 方以智：《天类》，《物理小识》，第11页。

⑦ 方以智：《人身类》，《物理小识》，第79页。

⑧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船山全书》第一二册，第23页。

又说：“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①

还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②

由上所述可知，王夫之以“气”为最基本的物质性存在，从宇宙一本体论的角度批评了他之前一切唯心主义本体论思想。他还进一步提炼“气”概念的哲学纯粹性，使之与经验感觉中的各种现象之气区别开来，将“气”的存在状态规定为“诚”与“实有”，从而使“气”的范畴与现代唯物论的“物质存在”范畴颇为接近。他说：“太虚，一实者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③

又说：“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无有弗然，而非他有耀也。”^④“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⑤

王夫之还从多方面对其哲学的核心范畴“诚”进行深入的阐释。首先，从语义的规定上，他将“诚”看作是“无对之词”，是表示绝对实有的最高哲学范畴。他说：“诚者，无对之词也。”“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更无一字可以代释，更无一语可以反形。”^⑥

其次，从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角度看，“诚”虽然不依赖于人的感官而绝对实有，视而不可见，听而不可闻，但是可以为人所信、为理所允、历然充盈。如王夫之说：“诚则形，形乃著明，有成形于中，规模条理未有而有，然后可著见而明示于天下。故虽视不可见，听不可闻，而为物之体历然矣。”^⑦

王夫之还从“体用相胥”（“相胥”即“相共”之意）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气—诚—实有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主张。他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

①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船山全书》第一二册，第30页。

②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船山全书》第一二册，第26页。

③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船山全书》第一二册，第402页。

④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四《洪范三》，《船山全书》第二册，第353页。

⑤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上》，《船山全书》第二册，第306页。

⑥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离娄上篇》，《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97页。

⑦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船山全书》第一二册，第422页。

有而相胥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①

王夫之将宇宙的本体规定为生生不已、变动不居的“实有”，这样就从根本上批判了佛、老将宇宙本体规定为“真空”“无”的唯心主义观点，从而提出了“破块启蒙，灿然皆有”和“富有日新”的哲学理想。他说：

然则彼之所谓“真空”者，将有一成不易之型，何不取两间灵、蠢、姤、丑之生，如一印之文，均无差别也哉？是故阴阳奠位，一阳内动，情不容吝，机不容止，破块启蒙，灿然皆有。静者治地，动者起功。治地者有而富有，起功者有而日新。殊形别质，利用安身，其不得以有为不可依者而谓之妄，其亦明矣。^②

王夫之的观点很明确，如果按照佛、老的本体论观点看，现象界的万物就会像印文与印章的关系一样，与预先固有的模型相同。然而真实不妄的实有世界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下，是一个无需人为安排、生生不息、灿然富有的生化过程。万有世界之物的差异存在正好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存在基础。可以说，王夫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围内，使传统的气本论思想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所允许的高度。

上述这些气本论思想的文献，特别是王夫之的一系列著作，戴震等人未必皆能见到，但黄宗羲的部分著作他们是可以看到的。王夫之的有些著作也收入到《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类”之中，时人或许能看到王夫之的少量著作。因此，清代前中期崇尚“气化论”的思想家应当与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等人的气论思想有内在的关联性。

二、重视实证的学风与徽宣地区重视天文、历算学之学术环境

顾炎武在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过程中属于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提出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八字箴言对于明亡后至清初的士林有很大的影响，而他提出的“舍经学无理学”的学术口号，使得清初的学术风气为之一

①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二《大有》，《船山全书》第一册，第861页。

②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二《无妄》，《船山全书》第一册，第887页。

变，经学研究逐渐取代了理学的思辨与心学的蹈虚学风。而“质测”之学的兴起在当时是新生事物，对于晚明士风与学风的影响很大。从16世纪中后叶到17世纪中叶近百年的时间里，有一批科学著作问世，如1578年李时珍写成《本草纲目》，1606年朱载堉写成并刊行《乐律全书》，1628年徐光启写成《农政全书》，1643年曾由徐光启主持编纂的《崇祯历书》也已经成书，宋应星于1637年刊行《天工开物》，徐霞客于1637年写成《徐霞客游记》，而稍后十几年，王锡阐的《晓庵新法》与梅文鼎的《中西算学通》分别写成并刊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也大约成书于1640年。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也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古典的科学与数学知识，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与士人重视实证的学风起到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推动作用。康熙时编成一万卷本《古今图书集成》，又于1712年在畅春园蒙养斋内建立了类似于欧洲皇家科学院的算术馆，培养年轻的数学家，而此事与法国成立法兰西科学院相隔不到30年。康熙本人对于数学与天文、历法的爱好，在士阶层产生了无声而有力的影响。安徽宣城梅氏家族因为天算与历法的知识而受皇家的重视，在徽州宣城一带的读书人心中产生了无形的影响。此点对青年戴震致力于算术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关系。

就戴震青年时代学术成长的小环境而言，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指出，戴震早年的学术研究与徽、宣地区学术风气有内在关联性，他认为清初梅氏家族的“历学震烁一时”，歙人杨光宪极力攻击西方历学，虽因闰月失推之事而被处死，然为历法方面的守旧派所推重。另有歙人诸生黄扶孟，入清不仕，著《字诂》《义府》两书，阐明文字声义之相因。由此可知，徽人治历学与小学，其风气由来已久，再加上江永、汪凤梧等人闻乡贤之风而继起之，对于青年时代的戴震当产生了某种间接的影响。戴震的第一本著作即是22岁时著就的《筹算》，第二本著作是23岁时著就的《六书论》三卷（今佚），^①24岁著《考工记图注》，33岁撰成《勾股割圆记》。35岁之前，亦即在扬州与惠栋见面之前，戴震已经是一个学有专攻的自学成才者了。

三、重视音韵、训诂的传统，对宋明儒的思辨学风展开批判

还在万历年间，明人陈第就已经开始研究音韵学，著有《毛诗古音考》。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2页。

晚明以降，学人大都十分重视音韵、训诂之学对于经典研究的作用。顾炎武本人的学术实践，一方面重视实地考察，另一方面重视对古音韵的研究，并将音韵学研究的实绩运用到经学研究的过程之中，提出了这样的学术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① 这一经学研究主张，对于清初学术，特别是乾嘉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 而顾炎武在理学与经学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以经学代替理学的主张，对于清代学术更具有全面性的影响。他说：

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③

顾氏的学术实践及其学术研究方法也并非他的独创，同时代的思想家方以智、王夫之都有类似的主张，方以智在《通雅》一书中，对声音与意义、文字字形变化与经典研究的关系，均有深刻的论述。如方以智说：“声音之道，与天地转。岁差自东而西，地气自南而北，方言之变，犹之草木移接之变也。”^④ 又说：“非考古不能溯源，非博洽旁通不能知古。知其故矣，仍遵

①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页。

② 有关顾炎武对清代学术影响的最新论述，参阅董平著《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学海》2010年第2期）一文。不过，我们并不同意他这样的论断：以乾嘉考据学为典范的“清学”“虽然在研究的表面上与亭林的学术方法保持一致，但本质上却丧失了亭林以学术而求大道的本旨，思想被淹没于音义训诂之中……亭林之学术以经世以淑世的根本价值关切几坠于地”。乾嘉学术对各种典籍的文本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就学术精神而论，乾嘉‘汉学’的片面转向是疏离于甚至于逸出‘明道’的学术传统的。”不过，他认为该时代的“汉宋之争”并不仅仅是所谓的“门户之见”，而是在现实的背景下充分呈现出了“思想史的意义”，这一论断十分深刻。（见吴根友主编：《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05、523、524页。）

③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④ 方以智：《通雅》卷首一《音义杂论·方言说·凡例》，《方以智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案，此部分内容可参阅罗炽著《方以智评传》第七章《考据学与语言学》。

《正韵》征用，则“十三经”、《史》、《汉》，是艺林也。”^①王夫之的学术专长虽不在音韵训诂方面，但他亦深通此道，其专著有《说文广义》三卷，对于文字、声音与经典意义之间的关系，亦有深刻的认识。如他对多音字问题的看法就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他说：

一字而发为数音，其原起于训诂之师，欲学者辨同字异指、为体为用之别，而恐其遗忘，乃以笔圈破，令作别音，而纪其义之殊。若古人用字，义自博通，初无差异。^②

他又说：“有义无字，假它字以通之曰借，又从所假之义更借而它用曰转，要之各有义焉。若‘日磳’音密、‘焉氏’音支之类，或夷语，或方言，莫可究诂，无容啻为之说。”^③

不仅如此，王夫之著书多有稗疏，并附有考异、叶韵的内容，其重要的哲学著作如《周易外传》之前有《周易稗疏》四卷，并附有考异。在《尚书引义》之前有《尚书稗疏》四卷，《诗广卷》之外有《诗经稗疏》四卷，附有《考异》《诗经叶韵辨》等内容。另有《春秋稗疏》二卷，《四书稗疏》一卷，《四书考异》一卷。除《四书稗疏》《四书考异》未收入《四库全书总目》之外，其他四种稗疏类著作均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我们很难判断清代哪些学人曾经读过王夫之的这些著作，也还很难断定戴震是否读过这些著作，但王夫之在乾嘉时代绝不是默默无闻的学者，这一点应当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他从事哲学思考之前或同时重视训诂学通达经义的方法，与乾嘉学术，特别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重视训诂、声音与意义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路径，颇为吻合。顾炎武重视考文、声音与经义之间的关系这一学术思想与治学路径，决非只是一种孤立的学术现象。以往学者较多地关注了顾炎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现在看来，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等人均对清学乃至乾嘉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时代学风的变化而逐渐形成了一股学术思潮，乾嘉学者则将此为学的方法更进一步地精密化，并又引发出新的学问（知识）门类。

① 方以智：《通雅》卷首二《小学大略》，《方以智全书》，第54页。

② 王夫之：《说文广义·发例》，《船山全书》第九册，第55—56页。

③ 王夫之：《说文广义·发例》，《船山全书》第九册，第56页。

晚明清初的学术风气及学术前缘，对于乾嘉时代第一流的学人而言是共同的学术遗产。面对这一共同的学术遗产时，每人又因各自的学术起点、个人禀性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戴震曾说自己的学术是“空所依傍”，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表达，即他并非从某一个具体学人或学派那里获取学术资源，而是得益于一个时代的学术营养。

欲论乾嘉学术特征，除了重视学术史的前缘之外，亦不能忘记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气候。自1644年明王朝灭亡后，清初学术一方面沿着晚明学术的主流方向向着实证的学风方面转化；另一方面，由于清初残酷的政治环境，汉民族学者不敢公开议论很多问题，学术研究大体上转向以传统儒家经典的考证为主要对象的人文学的实证领域，从而将晚明以来兴起的广泛的实证学风狭隘化了。戴震的经学研究大体上是在清初的经学考证的人文实证主义风潮下成长起来的。

戴震学术思想的变化当以他在京城结识学界名流，在达官贵人家坐馆而广泛接触新知识有密切关系，其晚年思想的变化主要与入四库馆校读自然科学史类的著作这一阅读经验有关。大体而言，戴震一生的学术经历可以粗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以33岁第二次被迫入京为分界线；中期以33岁到51岁被荐入四库馆为限，约18年左右的时间；晚期以51岁到去世为止。第一时期又可以分作三个小的阶段，17岁以前为第一阶段，17岁到26岁为第二阶段，26岁至33岁为第三阶段。第二个时期不太容易分阶段，但客居扬州的生活经历，往返于京师，又在直隶、山西等地坐馆等经历，对戴震思想的形成当有深刻的影响。后期时间太短，以《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为代表，集中而又系统地表现了他后期的哲学思想。

第二节 结识惠栋之前戴震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

一、35岁之前戴震的著述情况

根据前贤与时贤的研究成果来看，戴震在结识惠栋之前就已经有相当大的学术成就了。从今天的学问（知识）分类来看，其学术成就大体体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若依四部分类则为经、子、集三部）^①：

其一，在科学技术史方面。戴震 22 岁撰成《筹算》，后改名为《策算》。而且自 22 岁以后，几乎每年都出版著作一种或两种。这即是说，在 1757 年结识惠栋之前，他已经是一个著作等身的青年学问家了。24 岁，撰成《考工记图注》，33 岁撰成《勾股割圆记》（三卷），又作《周礼太史正岁解》二篇，《周髀北极璿机四游解》二篇。

其二，在文字学与音韵学方面。23 岁，撰写《六书论》三卷，此书后来散佚，今仅存《六书论序》一文。25 岁，撰成《转语》二十章，今亦不存。27 岁，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

其三，在经学研究方面。31 岁，撰成《诗补传》。《法象论》亦约作于此时。

其四，在集部研究方面。30 岁，撰成《屈原赋注》九卷、《音义》三卷。

结识惠栋之前，有几封重要的论学书信颇能反映戴震的学术思想，兹列举如下，然后稍加分析。

其一，《与是仲明论学书》，段玉裁于《年谱》中记为乾隆癸酉年（1753 年），据钱穆考证当为乾隆己巳至庚午年间，即 1749—1750 年间，是戴震 26—27 岁之间的作品。据信中“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一句来看，若戴震自 17 岁从塾师处学习许慎《说文解字》始，至此年，正好十年。钱穆所订或更准确。

其二，《与姚孝廉姬传书》，该封信作于乾隆乙亥年，即 1755 年，戴震时 32 岁。

其三，《与方希原书》，该书亦作于乾隆乙亥年，戴震时 32 岁。

^① 参见张立文：《戴震》附录（年表部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1 年版。案：2011 年 11 月 23 日，在台湾“中研院”参加明清国际学术会议期间，笔者认识了美国圣塔克鲁兹加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胡明辉博士，他把他的论文《青年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士人社会的“局外人”与儒学的新动向》赠给笔者，该文以详细的史料、特别的视角揭示了青年戴震自学成才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可以说是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即青年时代的戴震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字词学以及方法论，并提出了崭新的经学知识认识论”（胡明辉、董建中：《青年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士人社会的“局外人”与儒学的新动向》，《清史研究》2010 年 3 期）。

二、35 岁前戴震学术思想简论

(一)《与是仲明论学书》与戴震学术思想的第一次总结

《与是仲明论学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戴震学思经历及其早年的学术思想。分析如下：

第一，戴震早年的学术成长经历主要是靠自学，没有专门的师承关系。在长期的摸索之后得出了如下的认识：“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 这是 30 岁以前的戴震明确的经学思想与治经学的方法论——即通过文字、语言的途径寻求“经”文中的抽象哲学道理——道。

第二，他的文字学研究起源于许慎的《说文解字》。然后又发现《说文解字》对于故训之解不能尽其意，又研习“十三经”的注疏，然后在学术思想上又获得新的认识：“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②

第三，除了文字与语言的功夫之外，从事经学研究还需要解决“若干事情”，这“若干事情”即是戴震后来概括的“制数”之学。这一段文字较长，但为了能充分揭示戴震早年的学术思想，不得不引证如下：

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齟齬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

①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六），第 370 页。

②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六），第 371 页。

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者（原文为竖排，故曰右——引者注）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槩，毫厘不可有差。^①

上述文献表明，戴震在30岁之前还花费了十年时间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古代科学史、古代数学史及西方传来的数学知识。其中除对中国勾股、缀术与西方三角形八线方法的优劣有不妥的认识之外，其余的部分都可以看作是戴震在文字、语言之外还重视“制数”的治经学术思想。如果比较简洁地来概括戴震的治经学术思想，大体上可以说是两条路线：一是传统的小学（或曰类似西方的语文学），一是典章制度史、科学史等史学知识。而这两种知识在人文学领域里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与可实证的特征，这也是晚明以来学者要求以“实学”（此词意义极其宽泛）代替宋明理学、心学的思辨哲学——“虚学”的共同倾向。戴震没有用“实学”一词，大约是因为宋儒也将他们的学说称之为“实学”，^②并以之与佛学与道家、道教学说区别开来。但在晚明、清代学者看来，宋明儒的理学、心学在对待经学的问题上过于偏重思辨，一方面缺乏故训的基础，另一方面缺乏对古代制度史、科学技术史的了解。要而言之，宋明儒在经学方面缺乏必要的实证性知识。因此，在戴震看来，他们的经学研究成果就难以令人信服。

第四，研究经学的三大困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③这是戴震在实际的经学研究过程中得出的切身体会，亦具有普遍的学术价值。

第五，从“道问学”的角度批评历史上的贤人，一类是博学而不精审的郑樵与杨慎，另一类是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的心学学派。他说：

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

①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六），第371页。

② 如朱熹讲：“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四，《朱子全书》第一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5页。）又认为《中庸》一书所讲的道理“皆实学也”。（参见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上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

③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六），第371页。